

萧袤“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

让典籍“活”起来，让童话“火”起来

□ 韩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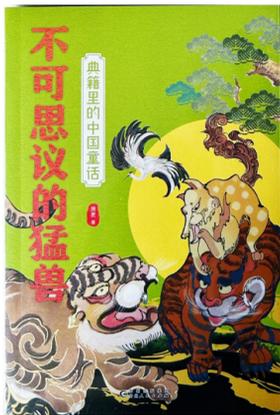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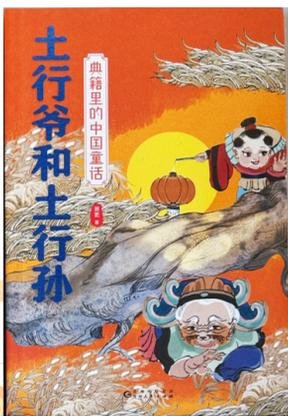


童话作家萧袤40年如一日，为孩子写了四五百部童书，获得国内多个儿童文学类奖项，又被译成英、法、俄、日、瑞、韩、越、泰等多语种输出海外，以“萧袤式”的幻想与幽默在儿童文学界独树一帜。新时期以来，萧袤将创作激情倾注到中国古代童话资源的发掘与创新上，继《童话山海经》(2022年)后，又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2023年)，包括《灯花婆婆》《我妈妈是仙女》《不可思议的猛兽》《土行爷和土行孙》4部童话新编，用中国童话滋养孩子心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开了一条童话创作的新路。

“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是一部了不起的童话创作。作者将今天的孩子看不到也看不懂的古代典籍里的童话故事挑选出来，用孩子们看得懂又喜欢看的现代童话语言，通过重述、改编、创新、创造等多种转化方式进行二度创作，让古老的童话因子长成枝繁叶茂的童话大树，成为孩子心灵可以“逍遥的花园”。中国“童话”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初晓在商务印书馆主编的《童话》丛书(1909年)，该丛书主要译介安徒生、格林、贝洛等西方童话大师的童话，也有少量中国故事的改编。此后又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周作人、茅盾、赵景深等人倡导“儿童文学运动”，提出改编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给孩子们看。然而，因为多方面原因，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在典籍汇编和古文今译两方面有了不错的成绩，但在推陈出新方面仍有所欠缺。

直到萧袤的“典籍里的中国童话”出现，才为中国古代童话找到了一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这条路有三个特征：一是对现存古籍里的中国童话做一次全面勘探、系统开发和现代化改造，完整呈现中国童话的精神和面貌；二是从文化传承的高度和儿童审美的视角，将典籍里“很童话”“很儿童”“很现代”的幻想故事挑选出来，作为创作中国现代童话的资源库，以童心相通和价值传承贯通古今，在孩子心田种下中国童话的种子；三是以经典的安徒生童话为创作范本，像鲁迅的《故事新编》和汪曾祺的《聊斋新义》那样讲好中国故事，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那样写一部《中国童话》。

“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是一套中国孩子的童话必读书。作者从今天孩子的阅读兴趣与成长需求出发，对典籍里的中国童话进行系统性改造，用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代替艰涩难懂的古文言文，给每篇童话取了“很现代”的名字，譬如《还记得我吗》《我妈妈是仙女》《灯花婆婆》《不可思议的猛兽》等，给孩子扑面而来的亲切感。根据作者自述，他“所做



“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全4册)《灯花婆婆》《我妈妈是仙女》《不可思议的猛兽》《土行爷和土行孙》，萧袤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

的工作就是力争取把隐藏在历史、典籍、民间深处的，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快要被淹没的有价值的童话形象‘打捞’出来，让他们成为熠熠生辉的童话明星，他也‘期待更多的人投入其中，共同开发利用，使古老的典籍焕发出生机’。孩子们从作者塑造的灯花婆婆身上看到了‘光明和温暖’的人性光芒，从钮婆婆用围裙变魔术的神奇中惊叹人生而平等的现代观念，从小矮人藻兼冒死进谒汉武帝的事迹中读到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生态意识，从胡媚儿的宝物琉璃瓶子里感受到丝绸之路的异域风情，从壶公的壶里为古人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而感动，从‘小人物’徐甲之死中体味到做人之本的诚信品质，从东方朔身上学习他敢作敢为的担当精神。孩子们还可以从《有巢氏》《董屋》《神农尝百草》《息壤》《中国的神舟飞船》等故事里为中华民族从创世到兴盛的创业史而感奋，在《细腰》《田螺姑娘当保姆》《唐朝的生鱼片》《游戏之山》等故事里了解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在《东方朔》《龙昌商求雨》《我妈妈是仙女》等故事里感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史，在《琉璃瓶》《不可思议的猛兽》《还记得我吗》等故事中感叹中华民族文明互鉴的交融史。

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可以在童话文学的

欣赏中提升阅读写作的语文能力。作者用心设计了类似语文课本的内在结构，将每一篇童话以作品、原文和随想三部分来展现。其中，“作品”是根据典籍原文重新创作的新童话；“原文”选自典籍，有正文、注释和大语文常识三项，与之前“作品”的联系类似语文试卷里给出的作文材料；“随想”是作者的创作感想，告诉孩子为什么要选这篇、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构思创作、想表达什么意思等，帮助孩子更好地阅读作品与原文，将读写能力培养寓于童话文学欣赏之中，对孩子语文成绩提升会有帮助。

我认为，该系列图书可以称得上是全民阅读活动的很好选择。这是一项很紧迫的童话探索工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贝洛童话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大人们说起童话也言必称西方，以至于给孩子们留下了一种“中国没有童话”的偏误印象，这是出于对中国童话历史的了解。对“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正可以给孩子们补上“中国童话”这一课，以史实为依据，建立中国童话自信。

这套书告诉孩子们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童话”之名，却有童话作品之实，这些作品就被记录在历代典籍里，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老子》《庄子》《孟子》《列子》，先秦两汉时期的《山海经》《淮南子》，魏晋时期的《列异传》《搜神记》，唐宋时期的《酉阳杂俎》

《太平广记》，以及明清时期的《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等。搜读这些典籍里的中国童话，孩子们会发现原来中国童话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与世界上任何一国的童话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走在世界童话的前列。如汉代《山海经》里的“小人国”童话比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早了大约1800年，唐代《酉阳杂俎》里的《叶限姑娘》比德国格林童话《灰姑娘》早了近千年，清代《广虞初志》里的《虎媪传》也比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早两个世纪，差不多与法国贝洛童话《小红帽》同一时代。

中华文化探源是文化自信之本、民族发展之基，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童话探源的意义不仅帮助孩子了解中国童话的历史，形成科学的童话观和历史观，而且也是中华文化探源工程的一部分，帮助提升孩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因为这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活水源头，是点亮孩子心灵的精神之火。让典籍“活”起来，让童话“火”起来，让孩子在童话中轻舞飞扬，孩子们从“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作品中接过的文化传承的接力棒，接收的是文化自信的自信心。

(作者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关注

为什么有的孩子早就厌学？为什么一些孩子怎么学也学不会？

为什么一些学生认为在学校里学不到东西？

为什么在各种信息唾手可得的年代，学习反而成了相对稀缺的宝贵品质？

这些问题都与学习有关，也与教育有关，而答案在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学习功能上，也隐藏在人类学习的发展演变历史之中。

学习是不是一种必需行为？动物学习与人类学习有什么不同？脑机接口或人机结合是意味着学习的进阶还是学习的终结？李初的《学习简史：从动物学习到机器学习》一书，系统梳理了与人类进化史相对应的6个学习阶段，明确了每一阶段学习的内容、内容、所产生的社会或文化影响，在溯源学习这一行为的前世、今生乃至未来时，挖掘出学习的本质，进而在教育层面做出最优选择。与许多讲学习方法的理论专著不同，《学习简史》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集合了学习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考古学、语言学、信息科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有关“学习”的最新成果，从神经连接的机理、人类通过语言学习的动因、文字和数学学习的联系、机器如何学习等面向一展学习的全貌，并进行哲学层面的学理分析。但这本书的“醉翁之意”不在科普，而是穿过“学习是什么”“为什么学习”等哲学迷雾，把握“如何成为终身学习者”这一时代之问。

更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全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即从一个我们耳熟能详却又知之半解的问题引入，如“动物会学习吗”“天才是天生的吗”“人类语言有何特殊之处”“教学为什么有用”“上学就等于受教育吗”“互联网教育为何失败”等，吸引我们反复印以为常却值得深思的教育话题，一直走进学习科学的深处，全面了解学习与物种进化、社会发展、科技跃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步步深入了解学习的内在，纠偏慢慢不合适的教育观念。

以早教领域的关键期为例，许多家长总担心错过孩子成长的某些敏感期，会带来无法挽回的结果。作者在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与其关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在早教上过度用力，不如看到大脑的可塑性，即大脑如同肌肉，能通过训练而加强，并借助美国9岁女孩卡梅伦·莫特的生活经历，强调终身学习才是科学育儿的硬道理。这对于化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回归教育本源，尊重科学规律，颇有现实意义。

从这种角度看，《学习简史》看似在讲学习，其实是谈教育，聚焦的是人本身，由学习与人的大脑与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的关联，引发学校的变化、教育的变革。书中的很多观点颇有启发意义，如“学习的进化史，也是人类超越动物的发展史”“有了文字，才能有系统反思，才能有哲学”“生存、生活、自我实现指向不同的人生目标，对孩子的教育因人生目标的不同而相去甚远”“人是学习的动物，学习是人的再生产，是有意识的进化”。不得不承认，唯有了解了学习的历史，抓住了学习的本质，才能把握教育的本质，真正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有效引导当下的孩子一窥学习的门道，成为爱学习、有良好学习习惯、践行终身学习理念的有趣个体。

由此，“学习”立传写史的行为，成为解开互联网时代儿童教育秘密的有益探索。的确，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教育理念或教育认知，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某些教育传统也正在遭遇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大势之下，教育必须顺势而为、及时转型，人类学习本身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需要一次新的革新，从明晰为什么学习达至学会学习的理想之境。

学习看似方法论，终究还是教育观的问题，观念的革新需要回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循着《学习简史》的精细梳理，让我们回望过去，追根溯源，一览桑田巨变，预见沧海之阔，把学习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把自己和孩子们打造成名副其实的自主学习者。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副编审、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讲师)

把握教育本质，学会学习

□ 张贵勇

评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研究》是“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新发展研究丛书”的主要成果，该丛书旨在“分析和归纳近十年来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重大理论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探索、核心议题的研讨、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各领域成果在我国的应用与实践，发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提出可资借鉴的建议。”基于上述思想，《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研究》在考察外国儿童文学批评演进的主体脉络，聚焦外国儿童文学批评走向的重要思想和理论问题的同时，用中国学人的视野、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严谨的逻辑推理向读者展示外国儿童文学这一文学门类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该著作的主体内容由七章构成，聚焦新时代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命题的研究。

中西儿童观念的交流互鉴

理解和认识儿童是儿童文学研究的首要议题，《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研究》就是围绕这一议题展开论述的。对外国儿童文学体现的儿童观的审视，恰与外国学界的“儿童本位”儿童观的论调形成呼应，构建起中外学者的对话交流模式。在探讨儿童文学概念的过程中，该论著强调辩证看待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的双重性，一方面，理论研究呈现大繁荣的格局，另一方面，学派众多，理论纷繁，而且有些理论触角显得过于精细。

该论著致力于揭示有自觉意识的现代儿童文学的缘起，及当代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发展进程。在现代儿童观形成之前，儿童一般被视为社会的预备劳动力，是尚未长大的成人，儿童的独立社会地位和人格往往不予承认。进入20世纪，伴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儿童心智的形成有了更为科学的了解，而精神分析学和无意识理论的出现，更促使人们对以往种种儿童观念和衡量儿童文学价值的标准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最终形成了儿童本位意识的儿童观。随着儿童观的更新与发展，专门为儿童和青少年写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的概念逐渐形成。

促进中西儿童文学研究交流

——评张生珍、舒伟的《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研究》

□ 刘江 王阳扬



《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研究》，张生珍、舒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

西方研究方法本土理论的融合

这部著作在考察外国儿童文学批评领域的最新发展和主流批评方法时，既采用了“大文学”的研究视角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描述和分析，又借助本土研究理论挖掘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因此，该著作并未将儿童文学研究局限于某一特定文化范畴，而是将其纳入到文学研究的整体中来，侧重呈现研究的多元化倾向。

童话心理学通过发生论和认识论视野，深入考察贯穿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发展时期的理论建树，相互交流与对话，接受与影响。“改编、跨媒介与流行文化”观照的是在新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跨越不同媒介形式来复现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与特征，特别是近年来最为常见的由小说或漫画改编成影视作品趋势。这种改编在对莎士比亚的青少年版本的编写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更在新的时期呈现出了跨媒介的特质。此外，在儿童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同样也会包含跨媒介的质素，在儿童文学的全球化传播过程中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交流重任。与此同时，儿童文学对流行文化的影响以及互动，不仅审视了儿童文学的流行趋势和最新发展，也考察了儿童文学与大众文化及流行文化的关系。“外国儿童文学叙事研究”探讨以《黑暗物质》(His Dark Materials, 1995-2000)三部曲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1997-2007)系列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具体叙事策略，特别是基于我国新兴本土研究理论双重叙事视角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考量儿童文学的故事层面与话语层面的界限与融合。“多元视野下的儿童文学批评研究”则涵盖了比较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跨界文学研究、审查制度、馆藏研究等维度，并通过对不同研究范式的历史溯源及特质梳理，关注新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下儿童文学研究的多元发展现状，思考在新的历

史时期，特别是从后人文学视角出发，探讨在青少年文学中虚拟现实等科技创新通过何种方式改变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新认知。此外，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同样可以对后现代绘本的形成条件和构成元素等问题进行综合阐发。该部分探索了儿童文学对生态危机的凝视与思忖，探讨儿童文学如何将生态意识融入文本之中，从而帮助儿童或青少年学会应对环境挑战，成为积极的行动者。

中国声音在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中的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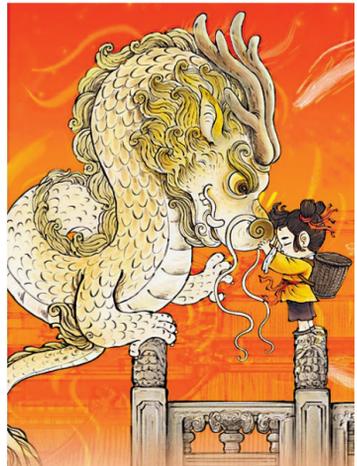
《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研究》跟进儿童文学研究的主流和前沿，做前瞻性研究，拓展研究边界，致力于在外国儿童文学批评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新时期以后，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获得了极大发展，无论是国别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在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相比之下，我国学界的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仍然较为薄弱，成为外国儿童文学研究学科领域的短板。放眼世界，不少国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超越了单纯关注题材、表现手法、以及简单讲道理、传递某种道德价值的诠释层面，进入到哲学、美学、心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深度融合的批评阶段。国内研究缺乏总体上的、学理性的归纳总结，对不同时代儿童文学批评文献的学术研究、历史传承与演变等，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辨和阐释。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在新时代，建构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并指导中国儿童文学写作实践，无疑成为当下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研究》在秉承中国立场和中国视野，对外国儿童文学批评史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审视与阐发的时候，注重强化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运用新的学术资源、新的学术视野，包括相关的发生论和认识论等理论批评工具，考察自儿童文学学科研究兴起至21世纪外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新发展，从而尝试建构中国视阈的外国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话语体系和学理体系。

(作者刘江系南京师范大学教师，王阳扬系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

童心世界



《故宫寻龙奇遇记》插图，李志关绘，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1月